

JINGTIANDONGXIN
LIANGDAN
YUANXUN



惊天动地的 “两弹”元勋

何建明/著

- ▶ 他是邓稼先、李政道的老师
- ▶ 他是中国“两弹”研制的主要贡献者
- ▶ 他是中国核物理的泰斗
- ▶ 他三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 ▶ 他的人格魅力可谓光芒四射

他就是——王淦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JINGTIANDONGDI DE
LIANGDAN YUANXUN

惊天动地的 “两弹”元勋

何建明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天动地的“两弹”元勋 / 何建明著.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64-8924-0

I. ①惊… II. ①何…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2727号

JINGTIANDONGDI DE

LIANGDAN YUANXUN

惊天动地的“两弹”元勋

著 者 何建明

图片提供 常熟市档案馆 王淦昌故居

出 品 人 钱丹凝

责任编辑 杨璐璐

封面设计 韩健勇

版面设计 杨璐璐

责任校对 石永革 繆栋凯 等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169mm × 239mm

印 张 14 字 数 180千

插 页 4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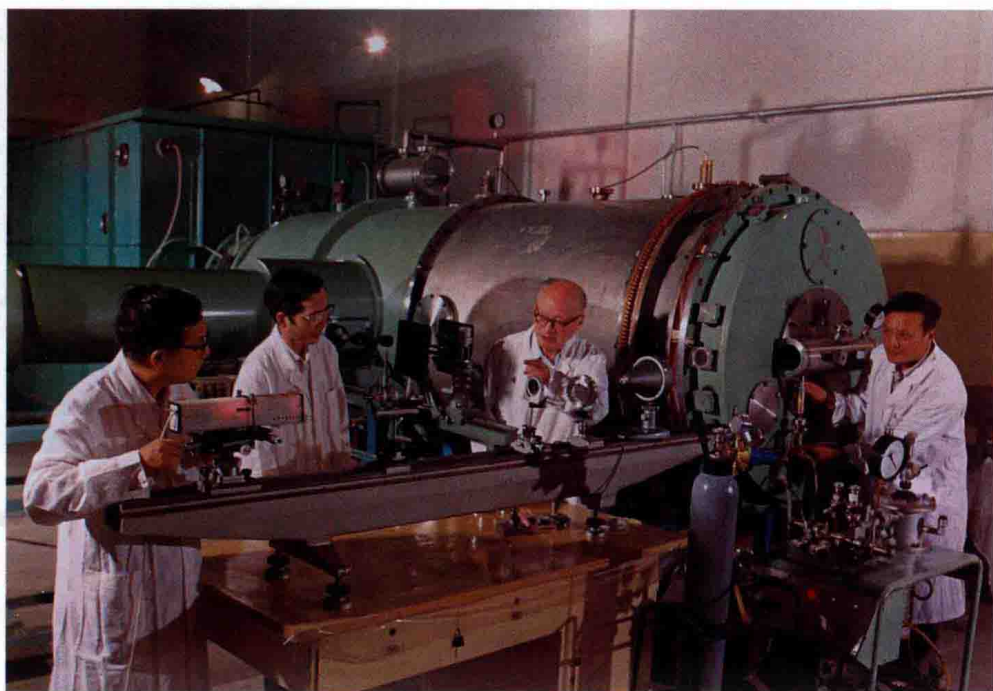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64-8924-0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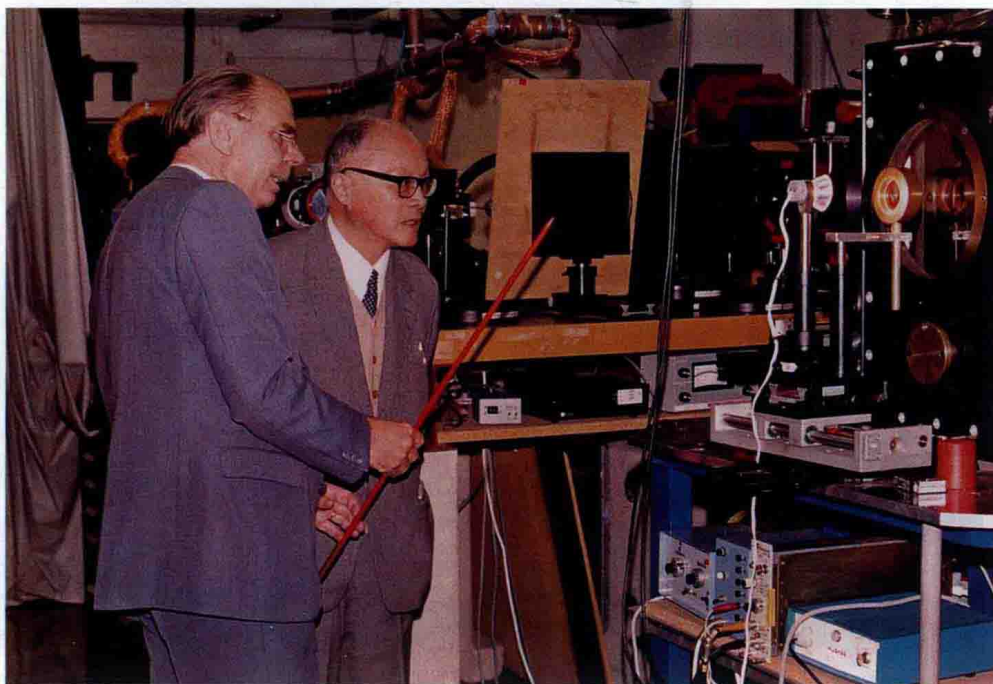
邮购: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电话: 028-87734035 电子邮箱: SCKJCBS@163.com

(本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1989年王淦昌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氟化氪激光装置前指导工作。
左起：王乃彦、洪润生、王淦昌、单玉生



◆1985年6月王淦昌参观德国伽兴等离子体研究所，Witosui所长讲解



◆1997年4月18日，王淦昌院士在香港做惯性约束核聚变演讲



◆1984年7月，王淦昌在“日本原子工业讨论会第17届年会”上做报告



◆1991年，王淦昌（前排左四）主持国家同步辐射加速器和光束线实验站鉴定会



◆1984年王淦昌（中）参观德国伽兴等离子体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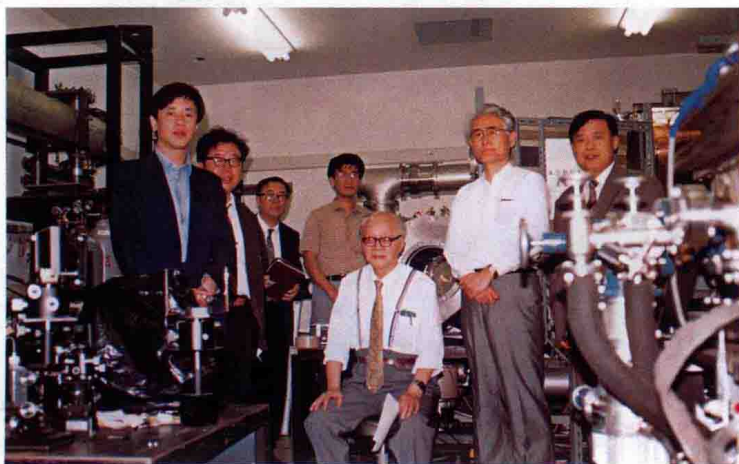
◆1985年王淦昌（右）在实验室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实验



◆1986年3月3日向中央领导人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863”计划）的四位科学家。右起：王淦昌、杨嘉墀、王大珩、陈芳允



◆1987年5月28日祝贺王淦昌八十寿辰学术报告会后留影。前排左起：周光召、伍绍祖、周培源、严济慈、王淦昌、杨嘉墀、赵忠尧、钱学森



◆1991年，王淦昌访问日本横滨电气技术实验室

惊天动地的“两弹”元勋



◆王淦昌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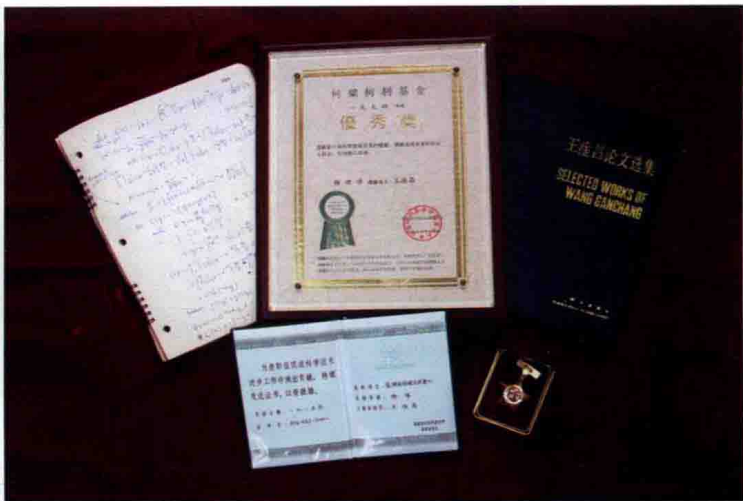
◆1992年，王淦昌在常熟市支塘中学（现王淦昌中学）大门前留影



◆1992年，王淦昌回到阔别50年的故乡江苏常熟，受到家乡人民热烈欢迎



◆王淦昌的“两弹一星”荣誉功勋奖章盒



◆常熟市档案馆珍品——王淦昌档案



王淦昌先生

中国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新中国核科学和核武器
研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中国式巨人

（写在前面的话）

他是一个特别神秘又特别有趣的人。他一生口头上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有趣”。而他从事的工作，就是国家最“有趣”，也是最高机密的事：研制核武器。

他实实在在、全程地参与了中国的“两弹”——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在一长串功臣人物中，他的光芒可以用“无人可比”四个字来作定语，因为他是王淦昌。

我没有为同一个人写的作品进行续篇修订的习惯，但对王淦昌先生例外。因为20年前我作为第一位作家为他的事迹“立传”时，除了自己的功力不够成熟外，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国家最严密保护的“绝密人物”的许多事还不允许被揭秘，所以也就无法真正把王淦昌先生的许多“有趣”的事完整地写进去，这样给外界造成了很多误解和习惯。比如一说“两弹元勋”，人们就会想到邓稼先；一说华人获得诺贝尔奖时，就会

赞美李政道、杨振宁……由此这些人物便在公众印象中特别熟知。确实，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和著名科学家。

可读者知道吗？邓稼先见了王淦昌先生可是毕恭毕敬得叫你难以想象。有一张照片是邓稼先衣冠不整地站在王淦昌先生身旁那么拘束紧张的神情，看后叫人有些好笑。邓稼先是王淦昌的学生和助手，每每王淦昌有事叫他时，那邓稼先从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与延缓，这是习惯，也是邓稼先本人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基石。李政道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全球华人中第一次获此殊荣者。李政道获奖时只有35岁，其成就足够他骄傲一辈子的了！然而，李政道在王淦昌面前同样是毕恭毕敬，因为李政道也是王淦昌的学生。当年李政道当王淦昌的学生时，王淦昌已经有两次机会与诺贝尔奖拥抱，并已经成为世界上排得上名的少数几个中国著名科学家之一。



1982年7月，国家科委颁发证书，表彰王淦昌等同志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



1982年10月，国家科委颁发证书，表彰王淦昌等同志对聚变裂变人工热核反应研究取得成果

王淦昌在新中国“两弹一星”的伟大科学成果中，特别是在俗称“两弹”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中，他是名副其实的功臣和主要贡献者。

“两弹”到底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怎样的力量？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并不太清楚。那我就说一句这样的话：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快70年了，即使今天我们的经济实力升至全球第二，我们的高速列车飞驰在世界最长、最快的道路上，我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的城市全球最多……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世界第一”，可是所有这些“第一”，如果没有了原子弹和氢弹，我们依然会是随时被人欺凌的二流、三流国家，遭灭亡的灾难也可能随时降临……这就是有没有“两弹”的差异。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毛泽东在世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能否不被别人欺负，手中握不握有原子弹是绝对的砝码。

中国之所以在近半个世纪里没有被各种反华势力的吓唬所威胁，就是因为我们也拥有原子弹，以及还有比原子弹威力更强大的氢弹。原子弹和氢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技术的航天工程，我们合称其为“两弹一星”。“两弹一星”代表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科技成果，这也是中国巍然挺立在世界面前的一道不易摧毁的“长城”。13亿中国人之所以特别尊敬“两弹一星”功臣，其理也在于此。

一提“两弹一星”功臣，我们自然第一个就会想起钱学森大师。排列在钱学森之后的是谁，或许很多人可能就有些模糊了……邓稼先？朱光亚？钱三强？还有很多很多叫得上名或者叫不上名的大科学家们。事实上，这群星璀璨的功臣中，我们必须和最应该首先记住的科学巨人就是王淦昌先生。

一直以来，“王淦昌”这个名字多数中国人并不熟悉，就是因为“两弹”工作开始到成功及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从事这项工

作的专家们情况是保密的。为首的多数重要的科研专家，是绝不允许公开身份，唯有钱学森、钱三强等少数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人是例外。而真正负有核心任务的一线科学家们必须长期隐姓埋名，王淦昌在这些大科学家里，可以说是排在最需要隐姓埋名的第一、二号人物。因为他在受命从事领导核武器研制前，就已经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科学家了。世界同行中都知道中国有个“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纽约时报》多次这样报道）。

我和王淦昌先生是江苏常熟老乡，而且出生在同一个叫“支塘”的小镇。我们这“一文一武”在老家算是很有脸面的“名人”——当然我无法与王淦昌先生相提并论，只是我被算作当代文学家而已。王淦昌先生比我年长50岁，论辈分属于我爷爷辈。如果他活着，今年正好110岁。在老家，我何家与王家相隔二三十分钟步行距离；在北京，王先生在世的时候住在木樨地“部长楼”里，与我居住的三里河北街也只有两站公交车的距离。

实话说，小时候在老家时，我并不知道家乡还有一个大人物“王淦昌”。因为除了年龄差距外，主要是王淦昌先生少年时代离开家乡求学出去后，一直在国外和外地工作。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十七年中隐姓埋名秘密生涯的缘故，我们家乡人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一直到“两弹一星”揭秘、宣传“两弹一星”越来越多后的今天，家乡人才慢慢明白，原来有位国家大功臣是我们“常熟人”“支塘人”……

“两弹一星”的工程太庞大，太伟大，到底谁的功劳大，谁在其中的地位重要，其实根本说不清。就拿“两弹”的原子弹、氢弹研制来说，当时我们中国调用的人力、物力及部队，就有几十万人，涉及的单位及条块部门，则多达几百个，真可谓举“国家之力”，甚至连国家都有点是在使“吃奶之力”——当时的我们太穷，穷得只有几台低级的计算器。庞大的数据计算竟然是靠几台手摇计算机以及计算尺和几十部、几百部算盘，进

行几万万次的人工运算才完成的。而这样的事在当今世界的“核俱乐部大国”中，唯有中国是这样干出来的。毛泽东当年称原子弹是“争气弹”，它饱含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决心与意志。

曾经还记得，在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几天里，西方世界的媒体热闹翻了，他们都在猜想不可能发生的事在中国发生了！而为什么中国也能造出原子弹，就一定是有“中国的奥本海默”！美国是第一个造出原子弹的国家，而且也是第一个使用了原子弹的国家。应当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日本广岛进行“原子弹轰炸”，从某方面来说——这是彻底致使日本军国主义灭亡、缩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重要原因。

一颗原子弹可以导致几十万，甚至百万人瞬间丧失生命。原子弹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之一，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强好几倍甚至几百倍。如果它要使用一下，那将丧失的就可能是一个国家亿万人的生命了！

“两弹”之所以可以支撑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的强林之列，意义和实际作用都在其中。钱学森大师之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崇高而特别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中国“两弹一星”的主要奠基者、科技方面的“总司令”。

我们知道钱学森的地位，现在就该明白和清楚另一位长期隐姓埋名的巨人了。他就是王淦昌。

虽然与王淦昌是同乡，又几度居住在其“近邻”，然而真正与这位神秘的科学大师相见，并不容易。在他从事核试验的几十年里，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可能与其接触。“我们也是几年才见一两回”，他的子女告诉我。

1995年这一年，国家颁布一项重要的科技奖——“何梁何利奖”。这个奖项是香港爱国金融实业家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就是生产力”的号召，专门拿出巨资设立基金来奖励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

当时这个奖的奖金是一百万元，超过任何大奖，影响很大。第一次颁奖是在人民大会堂，由江泽民总书记出席，李鹏总理宣读国务院颁奖令。获此殊荣的有四名大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钱学森、黄汲清、王淦昌、王大珩。钱学森不用介绍，大家都很熟悉。黄汲清是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上的功劳，与“两弹”中王淦昌的功劳差不多。如果说李四光是发现大庆油田技术方面的“总司令”的话，黄汲清就是“总长”的角色。名列第三的王淦昌就是因为他在“两弹”上的杰出贡献，所以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这个大奖。最后一名王大珩，是光学专家，他与王淦昌等四位科学家向邓小平建议倡导著名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而闻名。所以看看这四位大科学家，就知道本书主人公王淦昌的地位了。

在国家颁发这个科学大奖前几年，我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在中央某报社当记者。这是我有机会与这些科学大师面对面采访与交流的职业机缘。

我记得那次单独采访钱学森大师的场面：

“建明同志，今天我跟你讲讲‘零’吧……”钱学森大师上来就笑眯眯地对我说。

“零”有啥好讲的，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嘛！我心里这么想，大概表情也流露出来了。钱学森先生依然笑眯眯地转过身，在背后的一块黑板上用粉笔给画了一个坐标——这是我中学时数学课上常见的符号。

“现在你可以看到‘零’的作用。”钱学森开始给我比画：“这‘零’居于中间，像人的心脏，也可以称它为万物之源之起始点……一切事情皆从它开始，不管是数据，无穷大的数据，还是运动频率，它都是出发点与终结点。从它出发，可以伸延到无限远的地方；绕它而外延扩伸，是无限大的宇宙……所以在我们科学世界里，‘零’是宝贝，‘零’是最重要的数字之一，‘零’是一切事物和生命体的始发点、原

动力。人生也一样，从‘零’开始，有无限光明；从‘零’开始，失败了也能再走向成功……”

钱学森先生的这堂课让我记忆了一辈子。他的“零”思想刻在我心中一辈子，并一直在激励和鼓舞我如何认识事物、如何认识人生。

写黄汲清是我的本职。因为当时我在黄汲清所在部门的文学杂志当主编。那个时候，刚从部队到地方，身上保持着一股强烈的正义感，大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

黄汲清与钱学森等人获得了国家科学大奖后，就有人对我说：为何不去写写大庆油田的真正发现者黄汲清？

大庆油田的发现者不是李四光吗？在这之前，我与所有其他中国人一样，都知道大庆油田的发现者是我们书本上读到的“李四光”这个人，而并没有听说过另一位叫“黄汲清”的人也与大庆油田发现有关。

“黄汲清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庆油田发现者，你去采访就知道真相了。否则国家为啥要给黄汲清这么重要的科学大奖呀！”人家这样对我说。

我想想是呀，谁的话都可以怀疑，唯独国家的奖励不会奖错人吧！我这么想，也就越有了采访黄汲清的念头。

到黄汲清家后，我才感觉我犯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大科学家刚刚离世……当然也让我有很多希望的意外收获——当时有关黄汲清先生的各种“贡献”与“成就”几乎一起汇聚到他家和他的亲人那里。那些日子，我天天在黄家，在黄先生的亲人与同事、学生中间，聆听他们讲黄汲清先生的事。我同样没有想到的是，那些日子里，我简直是在阅读中国“科学全史”。我欣然读到了与鲁迅齐名的丁文江大师的事迹，读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陷害冤死的大科学家谢家荣（另一位大庆油田的重要发现者）的悲喜人生，读到了中国20世纪第一代科学家之间的恩恩怨怨，读到了知识界的崇高心灵与丑恶并存的“名利场”……当然，我更多读到了一位虽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小老头”，却心胸如高山

一般巍峨的一生为祖国奉献才智的伟大尊者黄汲清先生的心灵史——他一生埋头地质科学事业，为中国的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的发现与开发，特别是大庆油田的发现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写过钱学森、黄汲清后，我就直奔国家科学大奖的第三位大师王淦昌。这是我的老乡，我家乡值得骄傲的人物！必须写，必须写好。1997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并不太著名的作家，但也有些名气。似乎由于家乡人“吹嘘”的原因，王淦昌大师有所了解我。于是到他家后，王老十分开心，原因是“我们常熟的‘一文一武’终算见面了啊！”——他的原话。

“岂敢岂敢，您是大科学家，我是小小的文人。”在原子弹、氢弹制造者面前，我觉得自己弄几个文字的实在显得太渺小。

“哎呀，你可别小看了作家！你们这些人厉害，我就编不出故事！我笨得很。你看，我现在都不会计算机！”王老竟然这样谦虚。

老实说，当时我的脸非常红。同时又在想：像他这样把原子弹都能造出来的科学巨人，为什么在一个刚刚认识的人面前如此坦诚地亮出自己的“弱点”与短处？这样的人，不可能不被人尊敬！

“来来，给你这个小老乡看看这些……”就在我陷入窘境和思考的片刻，只见王老先生摇晃着身子，双手抱着一大沓书卷与资料，从里屋朝我而来。

“这是什么呀？”我问。

“研制原子弹的东西呀！”王老随口而出。

“啊——”我一听，竟然大声叫起来，并连连往后退。“这……这可是绝密东西！我、我不能看、不能看……”当了十几兵，知道什么是“机密”、什么是“绝密”。造原子弹的东西绝对是“绝密”之“绝密”。军人的职业习性，令我此刻全身毛骨悚然——那可是国家最核心的机密呵！

“哈哈……有趣！有趣。”哪知执握“国家大机密”的王老大笑起来，然后只见他轻轻地将手中之物放在桌子上，一边乐，一边有些气喘吁吁地对我说：“我知道你看不懂，所以给拿出来让你见识见识！老乡嘛，我不能骗你是不是？”他又大笑起来。

原来如此！

我也跟着笑了。这当口，我才发现：原来我的老乡、科学巨人也是位非常幽默之人。

“坐坐！我们来讲讲吧！”王老之所以对我“特别”，是因为我们见面一开始就用“常熟土话”对话。在异地他乡，能够用熟练的家乡话对话，实在是种美妙的“乡愁”享受。然而“常熟土话”之难懂、难听、难学程度，实在也令人头痛，它绝不比“广东话”逊色到哪里去。硬、直、拐弯多，恐怕是其特点。我之所以没有当成“小说家”和“诗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常熟土话”给害的——它无法让人理解其意。还有一点是：说常熟话的人改说普通话，基本上不会成功。当然，现在年轻的常熟人，他们的普通话不成问题。可我之上年岁的常熟人，再改说普通话，一听就不是那个味。故作诗写小说，语境就成为一大问题，所以我押韵和用土话叙事只得罢休。于是很有诗情的我和编故事不太差的我，只好当了个报告文学作家（自嘲）。不过，这并不影响在上海和苏州之间的常熟自古人才辈出的辉煌历史。

殷商时代，周部落诸侯周太王的长子伯泰（泰伯）和次子仲雍（虞仲），为了谦让尊位给弟弟季历的儿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两人结伴而行，千里迢迢，来到当时仍一片荒蛮的常熟、无锡一带，“断发文身”，垦田治水，渐得当地百姓拥戴和归附。兄弟俩后自称“勾吴”，从而使中华民族有了一块伟大的富饶之地和一个勤劳聪慧的族群。有史记载，伯泰与仲雍兄弟让贤的美德成为千古佳话。又说，这其中仲雍起的作用更大些，因为是他首先劝伯泰让位。兄弟二人看出父亲